

条约”，结果赋予了作为日本人的商租权。在各方面确定日本的政治势力的同时，朝鲜人的政治地位也和事变以前完全不同，在朝鲜人内部产生了支持日本大陆政策的潮流。例如朝鲜人集团村落的建成，“间岛协助会”的发展，朝鲜革命军的崩溃，以及朝鲜人脱离共产主义的倾向等。

但是正如本文所分析过的那样，朝鲜人共产主义运动的根基深而且广。因此，如果认为仅仅由于最近朝鲜人政治地位好转而出现的倾向能够永远保持下去的话，那将会后悔的。

关于在废除治外法权后，通过什么样的具体过程才能达到五族共和这个朝鲜人的民族问题，将需要作更为深入的探讨。

第四编 北满地区的共匪活动

第一章 哈东游击区的共匪运动简史

第一节 珠河中心县委的成立

1927年左右，鲜朝人进入构成哈东游击区中心地带的珠河地区种植水田。

“民国十六年前后(1927年)约有六十多户鲜朝人第一次耕种了约八十垧的水田，但因种子不好及其他原因而失败。第二年再开垦一百垧，合计有一百八十垧，也因种种原因未达到预期的效果。知道种植水田有利的朝鲜人陆续移居而来，曾一时达到有二百户种植一千垧水田的状况。但在旧军阀官僚的压迫下，尽管定了十年的契约，满人地主也仗势强制将这些水田收回，顿时由锦县、盘山县、西丰县的满人耕种了一千垧中的七百多垧。”

注：根据民国十九年(1930年)吉林省各县略志——珠河县——吉林省公署总务厅调查科的调查，珠河县总人口的约4%（四千人）是朝鲜人。

在满洲事变前，此地的共产主义者主要以这些朝鲜人为主体的。这一点很象吉东游击区的情况。迁满朝鲜人由于对中国人地主在经营水田中的惨重的封建

剥削、旧政权官吏的特殊压制，以及日本对朝鲜的统治等等，特别抱有反感，所以容易信奉共产主义。他们成为朝鲜共产党系统的一个组织，为获得种植水田的自由而斗争。上述一千垧中虽曾被满人收回七百多垧，但其后从满人手中夺回了二百垧，朝鲜人经营的水田达到五百垧。

昭和五年九月，朝鲜共产党重建筹备会满洲部发表解散宣言，在满朝鲜人共产主义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珠河地区也以此为基础进行改组，设立珠河县委。

这个珠河地区的党组织在满洲事变后经过如下变化：

一、昭和七年一月，满洲省委由奉天向哈尔滨转移的当时，

满洲省委——珠河县委（直属省委）：

二、昭和七年三月，北满特委恢复活动后，

满洲省委——北满特委（在哈尔滨）——
 { 乌吉密支部 { 不设县委
 { 同宾支部 { 直属支部

三、昭和七年七月，共产国际特派员来哈尔滨后，

满洲省委——
 { 阿城特别支部
 { 珠河中心县委（直属省委）

珠河中心县委的统治区域是珠河、苇河、同宾、五常、宾等各县。

四、昭和十年初，

满洲省委——珠河中心县委——特别支部

在珠河中心县委负责人老蓝之下，作为专职机构，设立了宣传、组织、军委、农委、少数民族各部。负责人分别由老包、王大眼珠子、老张、老吴麻、全东焕等担任。

当时特别支部设立于牙不力、侯林乡、石头河子，蜜蜂站①南沟、方正、双城、兴隆镇等七地，号称有党员一百三十人。

①原著中后页也有写为蜜蜂站的——译者

五、昭和十年九月，据滨江省特务科调查：

满洲省委——珠河县中心县委——

- 路北区委（珠河县第五区关门咀子）
- 路南区委（双城县帽儿山）
- 双东区委（双城县第九区十三保）
- 土山头地区委（珠河县土山头）

珠河中心县委的所在地是珠河县三股流，负责干部如下：

书记 满人 老包
组织部长 满人 白瞎子
宣传部长 满人 冯群

（专职机构只写了上面两个，但此点觉得调查的不够充分）

这个党组织拥有群众团体反日会、妇女会、游击连、青年义勇军、农民委员会和正规军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党通过在群众团体中组织的支部进行领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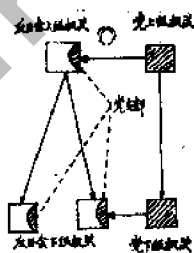
现将很多调查机关对有关党组织和群众团体，或正规军之间的关系所存在的误解指出如下：

第一、党组织和群众团体完全是分别独立的组织。

第二、加入群众团体的包含一部分党员，但并非全部都是党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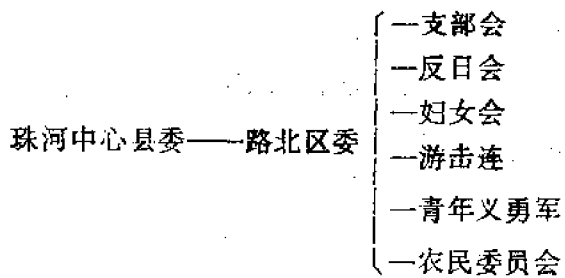
第三、党为领导这些独立的群众组织采用如下方法：

即群众组织中的党员组成支部，接受同级党组织的指示。在正规军中配备党员为政治委员，予以领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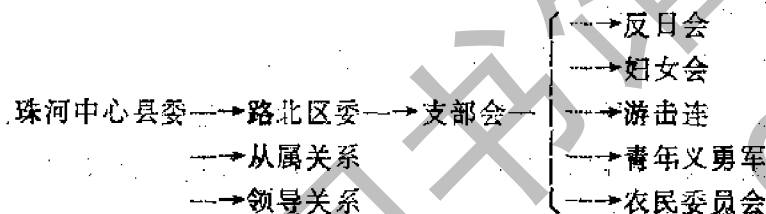


如图所示，党的下级机关对反日会下级机关的党支部，和党的上级机关对反日会上级机关的党支部分别给予指示。党支部按照这些指示领导群众团体进行工作。也就是并非从属关系的领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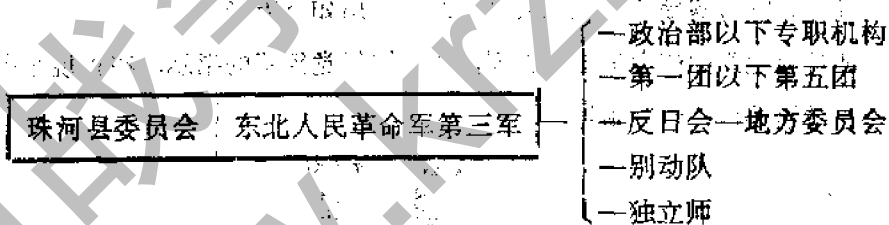
因而，如用下列图解即会引起误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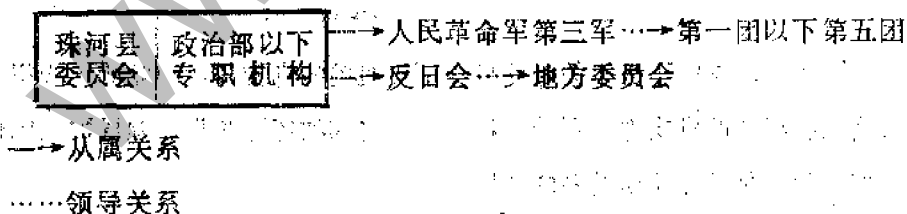
此图解似应如下：



又如用下列图解，便将党组织和群众团体以及军事组织杂乱无章地拼凑在一起，毫无意义。



此图解似应如下：



第二节 反吉林军的叛乱和红枪会的兴起

满洲事变以前的珠河地区的共产党，是以仅占人口一小部分的朝鲜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力量极其微弱，但在事变后迅速获得群众，这可能是由于下列条件造成的。

在主观方面：

- 一、反吉林军的叛乱；
- 二、红枪会的兴起。

在客观方面：

- 一、珠河地区的地理条件；
- 二、昭和五年以来，促使农业危机进一步加深的特殊经济条件；
- 三、反吉林军的叛乱。

昭和七年二月皇军进入哈尔滨市后的反吉林军的行动如下：

“我军进入哈尔滨市后，丁超、李杜等反吉林军逃入东北内地，北满得到暂时的安宁。但因离开中东铁路沿线难养大军，丁超等于二月末前后开始，逐渐在中东铁路东部沿线地区出现，与间岛叛兵联络。三月初出现于一面坡、海林、宁古塔方面，大肆抢劫，以至日人又受其害。驻守哈尔滨的天野旅团为保护这一带的日人，于三月三日从哈尔滨出发，到达一面坡。四日进入海林。

“三月五日天野旅团分乘汽车、卡车，由海林向宁古塔出发。

“我军进入中东铁路东线，叛军逃往内地，加以吉林军的讨伐，很难迅速再举。北满也驻有日本军队，因而可免深虑。”（《满洲上海事变全记》—朝日新闻社）

关于东北义勇军的情况，将在后面联系南京政府以及苏联加以叙述。

二、红枪会的兴起

今举其一、二例。在五常县：

“满洲事变后，受事变影响，治安混乱，小匪跳梁。到大同元年（1932年）四月，

灯山红枪会匪等大股匪团盘踞于小山子一带，袁海龙率两千匪贼盘踞于由对儿店到县城一带。同年五月，小山子被灯山占据，县城被袁海龙占据、放火抢劫，小山子和县城的重要地区都化为灰烬。

“当时自县长以下的县当局负责人及县内有力人物几乎逃光。公安队、保卫团相继叛变，同匪贼合流，县内完全无人统治，出现无政府状态。到七、八月，冯占海、官长海等反吉林军盘踞在从县城到山河屯一带。在山河屯放火。冯占海以山河屯为根据地设立五常县临时政府。到九、十月又得到红枪会匪的支援。但因日军开始积极的讨伐，和周围情况的变化，首先是匪化的良民逐渐归农，或投降高清山的靖安游击队，以表示归顺之意。”（《吉林省五常县概况》——五常县公署。）

“民国二十年十二月，反吉林军攻入县城，山林警察队也叛变，解除六八一团的武装。入城匪贼一千多人停留九天，抢劫县保卫团及各机关的公家武器后逃走。”

“大同元年六月，匪首双盛、李福、天元等率领一千多名红枪会匪突然前来袭击县城。民困因子弹少，为免于被攻打，伪装签订停战协定。但匪贼乘机抢劫商民财物、粮食，经七、八天后将全部掳获物装上马车运到其他地方。”

（《吉林省各县略志》——苇河县）

“延寿县城在大同元年十一月以前是红枪会匪的根据地。县内县长以下的官吏由匪贼任命，对县城内的居民课以重税，还采取抢劫等残暴行动，因此民力极度凋敝，惨不忍睹。”（同上延寿县）

“除土匪外更有红枪会匪大约三百人（匪首单克义、王自谦）企图大肆反满抗日。”（同上——珠河县）

红枪会原属于白莲教系统。白莲教是中国元朝末年出现的秘密宗教结社，是当时农民暴动的主体。最早，红枪会也是为防御土匪、反抗暴政而在河南省产生的。在中国各省中兵燹匪祸最惨重的是河南和山东两省。在这些地方发展起来的农民的宗教武装自卫团体红枪会，也随同山东移民进入满洲。

因此，在满洲事变治安混乱之时，红枪会的兴起绝非偶然，但是当时红枪会的兴起，与其说是由于它本来的社会性质，即自发性农民自卫，还不如说主要是

在反吉林军的影响下的反日暴动。

关于这一点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月指示中曾指出：

“第三种游击队，是各种农民的游击队（大刀会、红枪会、自卫团），其中有工人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参加，其成分多数是农民，因为他们的政治成熟不够，及军事技术的弱点，一部分（现在仍然是大多数）还在地主富农及旧吉林军官的影响和指挥之下，而不能使自己的运动走上真正革命的轨道。而且有时候简直被反动的领袖为自己的利益而利用了。”①

红枪会匪主要由反吉林军领导，共产党的影响极为薄弱，这种现象起因于珠河县委的错误领导。

中国共产党曾经在关内对红枪会作过如下决议：

“一、为消灭民族革命道路上的军阀红枪会是一大武器。因此我们在努力指导这种力量的同时，必须警惕不使军阀土豪利用他们。

二、使农民协会成为全体农民的组织，并使红枪会成为农民的武装组织。即在目前利用红枪会使农民协会得到发展，在其发展后以红枪会作为农民协会的武装力量。

三、红枪会是群众反对军阀政治的一种力量，但必须联合其他革命力量，并在革命力量的领导下才能达到目的。目前由于红枪会的组织涣散和迷信，不堪战斗，而且富于破坏性，缺少建设性。

四、我们必须教给他们组织方法的要领。但必须提的简单明瞭并易于为他们接受。作为有关组织方法的第一步，是使他们联合各地的红枪会，组织秘密的通信机关，以便于各方面的联系和互助。这个通信机关要逐渐成为一个领导机关。第二步是召集各地的红枪会、黑枪会等领袖，举行代表会议，成立简单的组织，并规定下列共同行动纲领。

- 1、抵抗土匪。
- 2、抵抗无纪律的军队的骚扰。
- 3、抵抗苛捐杂税。

①本文根据原件作了修订，但重点部分为日文原文所注——译者

- 4、抵抗征发伏役。
- 5、拒绝使用军用纸币，或要求用政府发行的纸币纳税。
- 6、要求公开地方财政并加以监督。
- 7、维持地方秩序，即参加地方自治活动。
- 8、反抗贪官污吏。

上列各项必须变成群众最容易懂的语言。红枪会目前的行动，只是在上列各项范围内的自卫组织，还不能够要求参加地方自治。我们决不能企图通过这种力量去获得全部地方行政权。

五、不一定要积极地反对红枪会的迷信。因为这种迷信正是他们团结和奋斗的根本因素。

六、在河南的特殊现状下，不论是真正的农民的红枪会，或是土匪性质的红枪会，还是为土豪利用的红枪会，都反对张宗昌、吴佩孚。我们当然要和他们组成反对这些军阀政府的统一战线，同时必须巩固真正的农民组织。

七、红枪会的指挥权经常落入土豪手中，易为土豪所利用。土匪性质的红枪会也便于土豪获得势力。我们对他们的政策是，如果他们不能在反对其他军阀的旗帜下结合起来，作为争取群众的第一步，要保护真正的红枪会，使他们从这些军阀政府的迫害下获得独立，第二步必须促使土匪性质的红枪会不为土豪所利用，而使之站在农民方面，和土豪对立。”

但是据满洲省委巡视员刘某在昭和十年七月十五日写的《珠河一般状况报告书》中说，珠河县委对红枪会竟采取了如下态度：

“全体农民在红枪会的‘老师’和地主豪绅的领导下用原始的武器进行了战争。这时我党在派性分子领导下，不仅没有进行工作，反而提出‘反对反革命的宗教’的口号，破坏了这场战争，使斗争归于失败”。

在这种状态下的红枪会匪，于各地进行了上述的骚扰。以后，由于进行讨伐，一部分人投降或归农，其他部分则在斗争过程中逐渐转化为用现代化武器装备起来的有力量的匪团，成为共匪，反满抗日匪的后备力量。

“最初，红枪会匪纯粹是为了地方村落的自卫和保安而组织的。一旦有事抄起一支枪就奔出来，一家有难，全村出动，一村受到袭击时，邻村群起相

救，以乡村自卫为目的。由于是宗教性的结合，遇事每有视死如归的勇敢精神，终于能袭击残暴的军队，甚至解除他们的武装，夺取他们的武器弹药，势力逐渐扩大，数量不断增加，成为不容置疑的巨大的力量，连官宪军队对其存在也无可如何。”

“最初，红枪会纯是村落的自卫团，和土匪作战并袭击溃兵，以缴获的手枪、步枪等进行武装；随着势力的逐渐增长，能正面抵抗官兵的镇压。官兵也把他們视同土匪，进行征讨。红枪会也乘势和土匪通力合作，在不知不觉之间感染了赤匪的行动，甚至有为了本身的存在而利用和操纵军阀、共产党及土豪等的情况。”（参阅末光氏著《支那的秘密结社和慈善结社》122页）

这是在关内红枪会匪活动的情况。满洲事变后珠河地区红枪会向匪团转化的过程也与此相类似。

第三节 地理条件和经济条件

已如前述，反吉林军的叛乱和红枪会匪的兴起，成为珠河地区匪贼产生的根源。

但是什么原因使这些匪团能对抗日满军的不断地讨伐并进行盘踞，以及共产党能使哈东形成和南满、东满同样有力的游击区呢？

一、第一、珠河地区是山区，对于匪团的军事活动是极为有利的自然条件。

例如，就同宾县来说，

“县内高耸的山脉，由东部县界毕展窝集向西方延伸，与蚂蜒河、牛样子岭、长岗子、青云山、高力山、乾坤岭等一系列高岭相连接。另从位于中央的长岗山起，向正北延伸，与大青山、四合顶、关门山、金凤山、金坑山等群峰相连，这两路山岭形成一大丁字形。而四合顶又是连结东西走向一脉山岭的高峰，因为它位于连接东、西各一脉山岭的中心，所以有四合顶这个名称。

“这些山上树林茂密，如果除去县城附近蚂蜒河流域的一部分和铁路沿线

南北的一部分，则未垦地很多，木材及其他林产品也很丰富，有些地区偏僻，马贼巢穴很多。据说和五常县交界处的西蚂蜒窝集、鸡爪岭、四方台岭一带，当地叫作小关岭，是因为这里是马贼头目“小”姓盘踞地区的缘故，而老岭、东蚂蜒窝集，毕展窝集等一带又名长关财，则由马贼“长”姓所盘踞。

“同宾县森林内贼窝比较多，它和东部拥有大密林的密山县下青沟岭方面及其他地方的匪贼横行不止是同一道理。一般通称这种地区为棒矿，是指流浪者及其巢穴的意思。”（《松花江沿岸地方经济事情》——满铁调查课）

又就五常县来说：

“本县山岳起伏，又多低地沼泽，北部、东部的丘陵逐渐形成山岳及山脉，形状圆而不险要，树木丛生，山沟里无数小溪流入莫勒思河及兰村河，两河汇合成拉林河，贯通本县。山沟、低地及丘陵、小山的坡面不少地方已经耕种，或长满落叶松树林、杂草及幼树。越近本县北部、东部，山势渐高，村落耕地减少，除幼树林外，老树苍郁，以至木材输送都感困难。象这样的地方正是农夫、伐木人、猎人、采药者和匪贼避难的好地方。”（《北满洲》——东清铁道厅发行）

也就是说，这些地方具备和南满、东满、吉东各游击区相同的地理条件，自古以来以马贼盘踞地和避难地而闻名。

其二、当前哈东游击区的一个特点是，珠河地区本身既是山区，同时又邻接阿城、双城、呼兰、宾、巴彦、榆树、方正、依兰等北满农业地区。山区地带既为游击队提供了巩固的军事根据地，同时那些北满农业地带又成为共产党活动的广泛的社会地盘。尤其是象下面所说的这些地方的农民苦于农业危机的侵扰，陷于贫困的处境，使这种倾向愈加严重。因此，哈东游击区的自然因素形成了象其他南满、东满、吉东各游击区不具备的有利的斗争条件。

其次再就经济条件来考察：

“近年来有关满洲农业问题的科学研究有明显的加强。但因地区辽阔，调查资料不够完全，留下了很多问题。然而根据最近达到的科学水平来分析如下：

一、根据表一，哈尔滨特产的市价从1928年起（小麦从1925年）转入下跌。

表一 哈尔滨特产市价表

年 度	大 豆	小 麦	高 粱
1907年	23.03	41.74	29.43
1912年	41.18	59.37	34.16
1917年	37.77	62.37	13.85
1926年	57.22	71.19	32.76
1927年	98.45	109.62	57.16
1928年	104.25	121.45	68.69
1929年	97.12	137.80	55.02
1930年	60.14	106.86	35.75
1931年	59.46	98.42	32.83
1932年	60.90	109.96	38.62
1933年	42.27	104.54	20.13
1934年	41.05	92.32	17.80

注一、根据雅西诺夫《北满农民现状》

二、以哈大洋为单位

三、1933年为12月数字，1934年为4月数字。

如以事变当时1931年来看，大豆跌价一半，小麦跌价三分之一，高粱跌价二分之一。

二、从表二（见218页）看，商品作物（大豆、小麦）的种植面积比例，北满是百分之五十点三（包含哈东游击区、吉东游击区在内的北铁东线是百分之四十七点五），南满是百分之三十一.九，北满方面要多的多。由于受特产行情下跌的影响，北满农民的现款收入大为减少，也就更加穷困。

三、从表三（见218页）看，北满农产品产量自1928年以来逐渐减少（小麦、玉米在1933年增加）。尤其是大豆、高粱特别明显。

表二 不同地方种植比例表

	商品作物			自然经济作物			
	大豆	小麦	合计	高粱	谷子	玉米	合计
南满平均	29.1	2.8	31.9	27.9	17.0	9.3	54.2
北铁东线	35.0	12.5	47.5	10.0	19.0	10.0	39.0
北满平均	31.6	18.7	50.3	11.6	18.4	6.4	36.4
全满平均	30.4	11.2	41.6	19.3	17.8	7.8	44.9

注：满铁调查课《满洲农作物收获额预想》

表三 北满各年产量指数表

	大豆	小麦	高粱	谷子	玉米
1982年	100	100	100	100	100
1931年	93	101	85	77	97
1932年	64	51	59	56	70
1933年	85	114	68	94	120

产量减少，加以特产品市价下跌，农民负担更为加重。

四、从表四看，1931年比1928年北满农民的播种面积每陌平均收入减少一半。

这种收入减半，再加上下列各种原因，导致了北满农民，特别是下层农民的贫困。

1.例如从大豆来看，地租和租税占它的生产费用的百分之六十以上。这两项支出在满洲几乎是绝对固定的。就地租来说，绝对额虽有减少的趋向，但佃租率由于地主的反对反而正在增加。北满农家的百分之三十完全租地耕种，还有百分之二十虽然自己有土地，但因面积太小，不得不租入土地。这种危机的打击最强烈地转嫁到这百分之五十的主要部分奴隶式农民的身上。

表四 根据哈尔滨行情北满播种面积每陌平均收入额（哈尔滨大洋）

	谷类	麦杆	蔬菜	家禽家畜	干草	计	指数
1922年	62.70	5.96	3.95	3.64	0.31	76.56	45.8
1927年	114.90	10.92	7.24	6.66	0.57	140.29	83.9
1928年	137.02	13.02	8.63	7.95	0.69	167.31	100.0
1929年	100.08	9.51	6.30	5.80	0.50	122.19	73.0
1930年	75.57	7.18	4.76	4.38	0.38	92.27	55.2
1931年	66.68	6.33	4.20	3.87	0.33	81.41	48.70
1932年	59.09	5.61	3.72	3.43	0.30	72.15	4.31
1933年	46.97	4.43	2.96	2.72	0.23	57.30	34.3

注：雅西诺夫《北满农民现状》

2.在大豆价格中运费所占的比重很大。例如从松花江下游的大豆产地运到大连的各项费用，约占大连特产交易所规定的大豆价格的一半。这一部分构成现代资本的垄断性利润，尽管特产市价下跌，而这种利润却极为固定，因而，在这种情况下危机的打击也转嫁到农民，特别是奴隶式农民的身上。

3.从表五看，谷物价格的下跌指数比其他衣料、建筑材料等工业产品大得多。农民用降低价格的谷物和现代资本垄断价格的工业品进行不等价交换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通过这种价格的剪刀差把危机的负担转嫁到农村。

4.北满农民主要是耕种旱田，其他副业（蔬菜、栽培、家畜、养殖等）很不发达。因此，副业收入的主要部分是大车和出卖劳力两种。又根据雅西诺夫的调查，如从副业收入占全部收入中的比例来看，播种面积少的占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中等的占百分之十左右，播种面积最多的只占百分之六。但是农业危机的发展对这些副业给予重大的打击。特产品价格的暴跌不只是直接降低了搬运费，还由于运输业者之间的剧烈竞争，又加倍降低了运费。加上近来匪

表五 大连批发物价指数表

	谷 物	衣料类	建筑材料	总平均
1928年	111.5	77.1	79.8	88.2
1929年	108.7	74.0	78.8	86.0
1930年	80.3	54.2	61.9	70.2
1931年	51.1	46.0	51.6	56.7
1932年	73.5	63.2	62.1	66.9
1933年	78.1	61.9	76.4	76.0

注一、根据满铁经济调查课各年度《满洲经济统计年报》编制。

注二、以1921、1922、1923这三年的平均值为一百。

贼骚扰，征用家畜和大车，这些副业已不可能进行。未被征用的由于治安的极端混乱，用大车搬运也很危险。这样，北满农民的收入不仅由于谷类价格的下跌，而且由于副业收入的减少而更加困难。

五、上述危机带来的打击如何反映在北满农业的经营上呢？

1. 昭和六年以前，北满的耕地面积每年都在增加，而满洲事变以后则一直减少，其内容如表六。

表六 北满各年度耕种面积指数表

	大 豆	小 麦	高 粱	谷 子	玉 米
1928年	100	100	100	100	100
1931年	108	124	97	104	111
1932年	84	97	76	81	87
1933年	95	116	80	115	139

大豆种植面积减少，谷子、玉米种植面积增加，也就是由种植商品作物向种植自然经济作物的转变，可以看出这是向封建性自然经济的迅速倒退。

表七 南北满各年度每町步平均产量表

		大豆 (公斤)	高粱 (公斤)	谷子 (公斤)	大豆 (%)	高粱 (%)	谷子 (%)
南 满	1928年	1,482	1,861	1,675	100	100	100
	1931年	1,259	1,611	1,412	85	86	84
	1932年	1,218	1,519	1,316	82	85	80
	1933年	1,382	1,731	1,439	93	94	86
北 满	1928年	1,413	1,511	1,670	100	100	100
	1931年	1,234	1,321	1,238	87	87	74
	1932年	1,027	1,063	938	73	70	56
	1933年	1,234	1,307	1,323	87	86	79

2. 又根据表七。

自1928年以来，每町步平均产量迅速下降，但是这种下降的比率，北满比南满更加剧烈。

农业生产力的退化和腐朽正在加剧。

北满受危机打击比较严重的主要原因大致如下：

由于在土地占有关系方面，存在半封建的大土地占有制，在经营形态方面，经营面积、耕畜头数的规模比较大，雇佣劳动力比较多，可知富农经营的色彩浓厚，加上商业高利贷资本的活动地盘比较大等等，这些是北满农业的特点。而且以大豆为中心的殖民地性的单一化种植过程，尽管比南满开展得比较晚，却进行得比较快。因此，尽管一方面大量表现出有向富农式资本主义经营方面发展的可能性，但是由于农业技术的落后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桎梏，只能

导致封建性的生产，结果使上述的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成为不可能。这种北满式的农业性质，使得这次农业危机给北满劳动农民带来了比南满更加惨酷的穷困和农业破坏。

第二章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的历史

第一节 第三军的成立

1933年（昭和八年）夏，珠河地区在珠河中心县委领导下成立了独立的赤色游击队，领导人是赵尚志。据说是北京法政大学出身，曾经是北满特别区域委员会的干部，队伍只有十多人。

满洲事变后，他加入北满游击队中有名的匪首孙朝阳的队伍，任参谋长。但根据满洲省委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书《最近的满洲工作报告——1934年》中说，“由于孙朝阳部占领宾县取得威信，一跃而成为数千人的大部队。但因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而陆续溃散，只剩下基本队伍一百人左右，孙朝阳已不能统率军队，计划投靠国民党，进入关内当官，队员非常动摇，正想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因此必须迅速将这支部队掌握在党的手中。

“过去对孙部的工作只由参谋长小赵一个人联络。现在则有韩人同志某某等大约十人进行赤化工作。

“这支部队的素质良好，大多数是破产农民，因此把他们争取到党的领导下的可能性比较大。

“汤原、绥宁、珠河的中心任务是创造党领导的赤色游击队，发展反日游击运动，建立赤色游击区。”

在满洲省委这个方针指导下成立的赤色游击队，在珠河中心县委领导下通过逐渐扩大势力，和吸收各路匪徒，到1933年底前后约发展到三百人。

1934年5月这支队伍改称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

以后致力于改编为人民革命军的工作。1935年1月25日哈东支队宣告解